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美〕詹姆斯·施密特 编

徐向东 卢华萍 译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美」詹姆斯·施密特 编

徐向东 卢华萍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美)施密特
(Schmidt, J.)编;徐向东,卢华萍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588-2

I. 启... II. ①施...②徐...③卢... III. 启蒙运动—
研究 IV. 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4100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 世纪与 20 世纪的对话

[美]詹姆斯·施密特 编

徐向东 卢华萍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4.5 插页 4 字数 590,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251-6,500

ISBN 7-208-05588-2/B·470

定价 48.00 元

编译者简介

詹姆斯·施密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及其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含义的研究。

徐向东：1965年生于贵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

卢华萍：1978年生于江苏。2004年于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于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美] 彼得·赖尔 艾伦·威尔逊 著 刘北成 王皖强 译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美] 詹姆斯·施密特 编 徐向东 卢华萍 译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前言

1783 年晚期,柏林的一个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文章,该文几乎只是顺便问道,“什么是启蒙?”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一场关于启蒙的本质和限度的争论在小册子和杂志中便风行一时。在这个过程中,启蒙运动的理想和抱负受到了如此透彻的审视,以致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后的批评者很少提出在 18 世纪 80 年代期间还不曾考虑过的要点。

只有这些论文当中的一篇,即伊曼纽尔·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在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这本书开始于一个姗姗来迟的任务,那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一些其他的文献。第一部分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关系到 18 世纪的德国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贡献。第二部分收集了一些近来的论文,这些论文探究了这个讨论发生的历史情境以及这个争论的参与者。收集在第三部分的论文反思了 18 世纪的这些回答对我们的时代的意义。在这个序言中,我想概述一下选择、编辑和翻译构成本书的这些论文的根据,并且对那些帮助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感谢。

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由于一些难以阐明的理由,不论是法国哲学家还是苏格兰的道德学家(只是提到两个最可能的派别)都不像他们说德语的同事那么关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当我准备从德国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选择论文时,主要有两个东西在引导我:一个是我本人对这场争论所关系到的东西的感觉,那是在我导论中要适度地讨论的一个题材,另一个是在我之前已经编选了类似文集的那些人们的选择。Norbert Hinske 和 Michael Albrecht 编辑的文集《什么是启蒙?——〈柏林月刊〉的贡献》(*Was ist Aufklärung? Beiträge aus der Berlinischen Monatschrift*,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从最先发起这个讨论的杂志中,选择了一些题材广泛的文章。紧接下来,Ehrard Bahr 编辑出版了《什么是启蒙?——论点和定义》(*Was ist Aufklärung? Thesen und Definitionen*, Stuttgart: Reclam, 1974),汇集了来

自其他杂志的一些更重要的贡献。三年之后,Zwi Batscha 选编了一些后来讨论出版自由的论文:《启蒙和思想自由》(*Aufklärung und Gedankenfreih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77)。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也有这样一些论文的翻译,这里我应该提到的是 Jean Mondot 编辑的《什么是启蒙?》(*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Saint-É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以及 Agapito Maestre 和 Jose Romagosa 共同编辑的《什么是启蒙?》(*¿Qué es Ilustración?*, Madrid: Technos, 1988)。尽管这些文集在选择和焦点上有所不同,它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切入点。

在德国,当时许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任何文集都很难忽视康德、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an)、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克利斯朵夫·马丁·威兰(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贡献。其他一些学者,例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Friedrich Karl von Moser)、卡尔·巴尔特(Carl Bahrdt)、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也都加入了这场争论。在 18 世纪的德国,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但是今日的读者对他们也许就不那么熟悉了。安德里亚斯·里姆(Andreas Riem)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例子:在 18 世纪晚期,主要是因为他的小册子《论启蒙》(*Über Aufklärung*)成为这场争论的最广泛阅读的一篇文献,他名声远扬。一些其他的贡献,因为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也值得收录进来,例如,约翰·卡尔·默森(Johann Karl Möhsen)的讲演在激起这场争论上首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也包括了某些仍然态度不明的朦胧作者(例如约翰·亨利希·蒂夫特伦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和亚当·贝克[Adam Bergk])的文章,因为这些论文发展了某些独特的论证路线,从而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广泛含义。最终,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关于思想自由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成为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贡献,因为它讨论了这场争论所导致的有关出版自由的问题。

即使德国的历史学家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不辞辛劳,德国的启蒙运动在诸多英语世界至多还只是个传闻。值得记住的是,在 18 世纪的欧洲,柏林曾经是颇为重要的一个思想中心,思想家们开始讨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现在是清查在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对进一步的启蒙(在普鲁士以及在其他地方)进行展望的时候了。本书第二部分的论文

探究了产生这种清查的情景。柏林星期三学会是发起和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个著名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是政府部门的文职人员和文人。京特·比尔奇(Günter Birtsch)提供了对这个学会的一个论述;乔纳森·克努森(Jonathan Knudsen)考察了对“大众启蒙”这个概念的讨论;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Frederick C. Beiser)追溯了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ph Vierhaus)分析了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仰和怀疑;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John Christian Laursen)解说了康德的公共性概念,戴尔·斯洛(Dale Snow)讨论了雅可比的政治思想;加雷特·格林考察了哈曼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他们都反思了这场争论中一些颇为重要的参与者的见解。

然而,18世纪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只有历史上的意义。启蒙运动处于这个现代世纪的开端,对于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状况,这些回答必定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本书最后一部分论文试图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询问18世纪的回答。在这里,着重点已经被放在那些要么尚未出版和尚未翻译、要么不容易得到的论文上。吕迪格·比特纳(Rüdiger Bittner)、马克斯·霍克海默、米歇尔·福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针对“启蒙计划”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格奥尔格·皮希特(Georg Picht)探究了启蒙思维的神学支流。哈特穆特·伯梅(Hartmut Böhme)、格罗特·伯梅(Gernot Böhme)和简·克内勒(Jane Kneller)分析了康德的思想中理性和想象之间的张力。罗宾·梅·肖特(Robin May Schott)和刘易斯·亨齐曼(Lewis Hinchman)审视了启蒙运动的“自主性”理想。最终,凯文·保罗·盖曼(Kevin Paul Geiman)对康德的政治著作中鼓吹的世界主义希望提出了一些反思。

历史文本与现今关怀的关系问题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出现在翻译这种活动中。不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把文本从一种语言、一个时代搬进另一种语言、另一个时代,他就会碰倒解释学的问题。这不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的地方。不过,有一些普遍的考虑引导着这部著作,对这些考虑作一些简单的说明就足够了。理想地说(当然,在翻译中胜于在任何其他的人类努力中,事情绝不会是理想的),应该有一种方式翻译这些18世纪的德语文本,这种方式既尊重把我们与启蒙运动分隔开来的历史距离,又尊重仍然把我们约束到这个运动的传统联系和用法。在推敲时代误置(anachronism)和古体(archaism)之间的平衡时,我们需要记住,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读英语著作,与他们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同事共同使用某些术语。因此,在碰到 *moralische Gefühle* 这个术语时,也

许值得记住的是,作者们可能是在思考苏格兰道德主义者称为“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而不是“道德感”(moral feelings)的东西,或者,在18世纪,一个 *Menschenrecht* 是一个“人的权利”(Right of Man),而不是一个“人权”(human right)。然而,18世纪的德语和英语曾经共同使用的其他术语,对于现在的翻译者来说就没有了。18世纪结束之际,约翰·理查德森曾经翻译康德对启蒙运动的著名定义:“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在那个时候,他使用“nonage”(未成年)这个英语单词来翻译康德的“Unmündigkeit”,这个词完全抓住了康德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现在,当我们保留“dotage”(老朽)这个词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nonage”这个词,所以翻译者就不得不后退一步,只好使用“immaturity”这个词了。但是,其他不太晦涩的古体值得维护,以便使人们意识到,这些文本不是远离我们自己的时代的文本。因此,在18世纪的英语中,就像在18世纪的德语中一样,人们尚能对一位修道院院长致以“lip service”(空口的应酬话),就像他们尚能对他致以“eye service”(尊敬的目光)一样,原来有一整套用来攻击神职人员的词汇,是自由思考的英国人和自由思考的德国人都享有的,但是那些词汇现在已被遗忘了。这样,我们就需要加一些脚注,以便提醒读者我们的语言曾经有过的用法。

在18世纪,德语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流动之中,哲学和政治术语一点也不确定。不同作者使用的词汇差别很大。贝克、蒂夫特伦克和费希特广泛使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术语,对那套术语进行翻译的约定已经合理地确立起来。但是门德尔松和赖因霍尔德则借重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的词汇,由于沃尔夫的著作很少被翻译成为英语,因此译者就必须采取迂回的路线:先从沃尔夫的德语著作到他的拉丁语著作,再从他的拉丁语著作那里试图发现一种回到英语的方式。哈曼曾经说过,“说话就是翻译——从天使的说话方式翻译为人的说话方式。”因此,在处理哈曼时,他正在使用什么语言是绝对不清楚的。巴尔特对出版自由的讨论依靠的是自然法理论的词汇,里姆和雅可比常常因愤怒而热血沸腾,恩斯特·斐迪南德·克莱因的论文采取了扮演腓特烈大帝的形式。这些在术语和风格上的差别值得维护,因为它们相当有力地使人们看到不同的声音,而这恰恰是作为启蒙运动的那个伟大的世界主义论点的一个中心部分。

由于编者和译者是从18世纪的原材料来工作的,就会有少数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后来的德语重印中的错误已被校正。这些错误基本上是细小的错误,但是至少现在的读者会知道,曾经有一位官员嘲弄说,为了促进政治稳定而限制出版,就像为了避免鼯鼠伤害田野而铺设乡间

路面,这位官员,并不像 Zwi Batscha 的文集中重印的那样是 von *Ryan* 将军,而是 von *Kyau* 将军。我们也努力让读者知道那些像 von *Kyau* 将军的人究竟是谁,并且澄清了一些可能有碍于今天的读者的理解的指涉和暗示。哈曼是一位典型的与外界隔绝的作者,鉴于这个缘故,在翻译他的文章时,我们已经添加了大量的注释。

接下来我们需要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赞助、劝告和帮助的人和机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EH)已经对这项计划慷慨资助。通过一项 NEH 的大学教师奖学金,我逐渐认识到 18 世纪德国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性。我自己感觉到在 18 世纪被追问的这个问题现在依然重要,作为三期 NEH 学院教师暑期讨论班的指导教师,我得以与那些分享我的感觉的学者们探讨这些论文。NEH 的文本和翻译分部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一笔经费,使我们的翻译工作得以可能。感谢 NEH 的 Stephen Ross 和波士顿大学项目赞助办公室的 David Berndt 在申请经费过程中的鼓励和劝告,感谢波士顿大学大学教授项目的 Susan Tomassetti 在管理这些经费上的帮助。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为了在翻译模糊的段落和鉴定晦涩的暗示上恳求帮助,译者和编者对朋友和同事多有打扰,有时候甚至打扰素不相识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 Karl Ameriks、James Bernauer、Daniel Breazeale、Walter Felscher、Anke Finger、John Gagliardo、George di Giovanni、Gail Huetting、John S. King、Ramona Naddaff、Kristin Pfefferkorn-Forbath、Sabine Roehr、Alexander von Schoenborn、Steven Scully 和 W. Daniel Wilson。在评审这些翻译、提出修改的建议方面,帮助最大的是如下这些人:Frederick Beiser、Rüdiger Bittner、Kenneth Haynes、Dorothy Rogers、Jonathan Knudsen 和 Gitta Schmidt。

感激最深的是下面这些人:Kevin Geiman、Garrett Green、Lewis Hinchman、Arthur Hirsch、Kenneth Haynes、Jane Kneller、Jonathan Knudsen、John Christian Laursen、Dale Snow 和 Thomas Wartenberg,因为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本书得以完成。与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一种乐趣。

最后,要是没有 Amélie Rorty 的热情,我绝不可能去从事这项计划;要是没有她的继续鼓励、她的持久忠告以及她的不断催促,简直无法设想我竟然已经完成了此书。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什么是启蒙? 问题、情景及后果/詹姆斯·施密特 1

第一部分 18 世纪的争论

一、这个问题及一些回答

我们应该对公民的启蒙做些什么?(1783)/约翰·卡尔·默森 51

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784)/摩西·门德尔松 56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1784)/伊曼纽尔·康德 61

对启蒙的思考(1784)/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 68

废纸捞金,或者对六个问题的六个回答(1789)/克利斯朵夫·马丁·威兰 81

二、理性的公共使用

论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致君主、大臣和作者(1784)/恩斯特·斐迪南德·克莱因 87

论出版自由及其限制:为统治者、检察官和作者着想(1787)/卡尔·弗里德里希·巴尔特 99

公共性(1792)/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 117

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1793)/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122

三、信仰和启蒙

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1784)/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147

对理性纯粹主义的元批判(1784)/约翰·格奥尔格·哈曼 157

论启蒙:它危害和能够危害国家和宗教吗,或者一般而论就具有危害性? 君主、政治家和神职人员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词(1788)/安德里亚斯·里姆 175

四、启蒙的政治学

- 莱辛所言:评《教皇之旅》(1782)/弗里德里希·亨利希·雅各比 196
 真的政治启蒙与假的政治启蒙(1792)/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 219
 论启蒙对革命的影响(1794)/约翰·亨利希·蒂夫特伦克 224
 启蒙导致革命吗?(1795)/约翰·亚当·贝克 232

第二部分 历史反思

- 柏林星期三学会/京特·比尔奇 241
 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约翰·克里斯蒂安·劳尔森 259
 论大众启蒙/乔纳森·B.克努森 277
 现代文化的成熟:哈曼和康德对启蒙的根本隐喻的对立看法/加雷特·格林 300
 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批评/戴尔·E.斯洛 316
 早期浪漫主义和启蒙运动/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 328
 进步:观念、怀疑论和批评——启蒙运动的遗产/鲁道夫·菲尔豪斯 341

第三部分 20 世纪的问题

- 什么是启蒙?/吕迪格·比特纳 355
 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一些评价/马克斯·霍克海默 368
 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格奥尔格·皮希特 376
 什么是批判?/米歇尔·福柯 388
 理性在多元主张中的统一/于尔根·哈贝马斯 403
 理性与想象力的战斗/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 428
 康德的想象力的失败/简·克内勒 456
 启蒙运动的性别/罗宾·梅·肖特 475
 自主性、个性和自我决定/刘易斯·亨齐曼 492
 启蒙了的世界主义:对康德的“崇高”的政治透视/凯文·保罗·盖曼 520

第二、三部分作者简介 536

译后记 540

导 论

什么是启蒙？问题、情景及后果

詹姆斯·施密特

由于许多东西，启蒙运动已经备受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对象这个观点负责。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最具威胁的方面。当一些人已经强调说，它关于“绝对价值”的怀疑论以一种“虚无主义的迟钝”感染了我们的文化时，其他人则建议说，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1]据说，启蒙运动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2]然而，也有人已经争辩说，启蒙运动假设人性是无限可塑的，这个假定为极权主义国家将所有个性的痕迹从其主体那儿抹掉的企图提供了思想灵感。^[3]也有人这样来批评启蒙运动，说它对道德冲突的悲剧特征麻木不仁，它天真地假设所有的困境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4]有人则争辩说，启蒙运动试图构造一个道德哲学，这个企图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它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贫乏的道德景象，一个对所有无法还原到工具有效性的价值进行压制的景象，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腐化变质的道德话语，在这个话语中，伦理评价退化为个人偏好的伪装。^[5]有人也这样来责骂启蒙运动，说它热爱“主人式的元叙述”，敌视“他性”（otherness）。^[6]它的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也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力。^[7]

只要看一下这些对启蒙运动的指责，人们就很想知道一个时期怎么会造成如此种类繁多的伤害。由于受到这么多用来反对它的指控的迷惑，并且对它的批评者的多样性感到惊奇，一个人就会忍不住问道，“启蒙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证明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18 世纪的回答

1783 年 12 月,《柏林月刊》发表了神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询问了纯粹根据民法来规定的婚姻仪式的可取性。观察到“在启蒙的名义下人们的心灵[都太经常地]陷入混乱”,策尔纳在一个脚注中问道,“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8]为了得到一个答案,策尔纳无需等待太长的时间。一年之内,《柏林月刊》就发表了摩西·门德尔松和伊曼纽尔·康德的回答。^[9]其他作者加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辩论扩展到其他杂志。^[10]到 1790 年底,这场讨论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当孤身独处的克利斯朵夫·马丁·威兰一眼看见了他试图用来擦屁股的一张废报纸时,他发现自己紧紧盯住上面列举的六个问题,这些问题以“什么是启蒙?”开始。^[11]

这些对启蒙加以定义的努力几乎没有驱除围绕着这个术语产生出来的混乱。策尔纳的问题引发出一系列的争论,回顾一下由此产生的文献,在《德国月刊》1790 年的一篇匿名文章中,那位作者论证说,这个术语已经变得如此分离于任何清楚的约定用法,以致当作者们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个人习性来整理他们对这个术语的定义时,对这个术语的讨论已经退化成为他们之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12]这个术语缺乏清晰的定义,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争论的地盘在讨论的过程中转移的方式。起先,“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是以如下争端为中心的:对公民的多大的启蒙是可能的或者值得想望的,更具体地说,对检查制度条例的进一步的解放是否可取?^[13]在这个争论的第二阶段,这些问题获得了新的迫切性,而那个阶段的起点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维尔纳(Johann Christoph Woellner)1788 年制定的宗教和检查制度法令。对检查制度的辩论现在与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可能张力的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14]最后,随着法国革命的爆发,尤其是在 1793 年 1 月对路易十六世执行死刑之后,讨论扩展到包括这个问题:启蒙是否会必然削弱公共权威的基础,进而导致政治暴乱?^[15]因此,在 18 世纪结束之际,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目的是要探究公共讨论、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

理性的公共使用

毫无疑问,策尔纳对 *aufklärung* (启蒙)的意义的理解就像他的文章所暗示

的那样含混。像门德尔松一样,策尔纳是星期三学会(Mittwochsgesellschaft)的成员,这个学会是一个与《柏林月刊》过从甚密的“启蒙运动之友”的秘密协会。^[16]1783年12月17日,也就是策尔纳要求对启蒙给出一个定义的那个月,J. K. W. 默森在这个协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论述“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同胞的启蒙做些什么?”这个问题,^[17]催促该协会的成员决定“什么是启蒙。”这个论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继续被讨论,门德尔松在1784年5月作了一个演讲,那个演讲充当了他随后在《柏林月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基础。^[18]因此,策尔纳的脚注与其说表明了他对那个术语的无知,不如说显示了由一些有影响的人(文学家、法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狭窄圈子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而星期三学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

“启蒙运动之友”协会是对18世纪上半叶在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盛行一时的大量秘密协会的一个新近补充。^[19]这样的协会满足一些需要。在一个许多人不再在正统宗教的礼仪中发现意义的时代,与这些协会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可能就提供了一个富有魅力和充满力量的替代。^[20]在一个君主国家的官僚体制的结构之外很少为政治力量的行使提供机会的政治体制中,许多这样的协会便提供了一个能够对政治意见加以辩论,对改革的纲领加以阐述的场所。^[21]最终,在一个具有严格定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中,秘密协会提供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同宗教、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成员能够相互接触,发现在公共王国中得不到的友谊和团结。^[22]正如默森在结束他的谈话时指出的,“启蒙运动之友”协会的成员能够履行他们作为“具有良好意愿的爱国者”的责任,只是因为“秘密印章”的保护下,他们既不再害怕冒犯赞助人,也不再“渴望荣誉或嘉奖”。^[23]

在致“启蒙运动之友”协会的一封信中,对于启蒙运动在普鲁士的未来展望,默森不是那么乐观。这封信是以赞颂启蒙运动在柏林的胜利开始的,可是默森却马上建议说,“启蒙运动之友”协会所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要决定为什么启蒙运动的理想已经受到许多公众的抵制。在“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后面屹立着这个更加麻烦的问题:“即使人们已经被赋予四十多年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为什么启蒙在公众中进展不大?”^[24]默森这里提到的“四十年”指的是腓特烈大帝的统治时期,在他执政的时候,腓特烈大帝就取消了书刊检查制度,允许对宗教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进行宽容对待。但是,政治不满不那么受欢迎,正如莱辛尖锐地观察到的,腓特烈的改革充其量不过就是“让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发表反对宗教的愚蠢言论”的自由。把在普鲁士人能够发表的政见与在维也纳、法兰

西和丹麦正在出版的东西相比,莱辛断言,腓特烈统治了“全欧洲奴性最强的领土。”^[25]到18世纪80年代,对于放宽检查制度的呼声在出版界已经开始出现,包括一篇发表在《柏林月刊》的匿名论文(此文后来证明是由“启蒙运动之友”协会的成员、法学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克莱因所写)。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引用年轻的腓特烈说过的话,通过巧妙地劝告这位正在走向年迈的统治者遵从他的年轻的自我的典范,这位作者隐晦地批评了腓特烈当前的政策。^[26]

默森的演讲在这个协会激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关系到究竟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取消对出版自由的限制。^[27]争论的核心是:对宗教、道德和政治关怀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讨论也许会削弱社会所依据的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信仰。一些会员感觉到,与过分迅速的公众“启蒙”相联系的那些危险乃是言过其实。门德尔松提醒那些胆怯懦弱的人,“一旦权衡启蒙以及它所导致的革命带来的利弊,人们就应该把一场危机的早期岁月与随后的时光区分开来。前者有时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危险,但实际上是改良的基础”。就算承认“一切明智审慎的人都应该因为形势的缘故而饶恕国家所持有的某些偏见”,门德尔松问是否对偏见的这种服从应该“通过法律和审查确立起来”,或者,是否就像“成功、感激和诚实的限度一样”,这种服从应该“留给每个人自己来决定”。他指出,近来蒙戈尔费埃兄弟^①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热气球的飞行,并以此来结束他的反驳。尽管不知道是否由他们的成就所引起的“伟大变革”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改善”,门德尔松问全体会员,“人们会因为这而对促进进步犹豫不决吗?”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时,他推断说,“永恒真理的发现就其本身而论是件好事;对它们的支配乃是上帝的事情。”^[28]

门德尔松的论证得到了社会上许多人的赞同,^[29]但是其他人则更加小谨慎。法学家克莱因愿意承认,一般来说,“每个真理都有用处,每个错误都有害处。”但是他也强调说,有必要考虑启蒙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实际影响。因为如果有时候个别的、独立的真理很难消化,那么它们将依旧没有说服力、缺乏影响。因此,有可能的是,“对某个阶级的人来说,某个错误能够使他们对值得更大关注的事物形成一个更加高级的概念。”在这种情形中,在促进公共的利益上,一个“有用的错误”比真理作出的贡献还要大。^[30]克莱因在司法部的同事卡尔·哥特利布·斯瓦雷茨(Carl Gottlieb Svarez),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斯瓦雷茨注意到

① 约瑟夫·米切尔·蒙戈尔费埃(1740—1810),法国航空发明家,与其兄雅克·艾蒂安·蒙戈尔费埃(1745—1799)制造了第一个可飞行热气球,并乘该气球升空。